

川帮银行家的形成与群体特征(1915—1937)

辜 雅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川帮银行家是近代中国银行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发端于晚清,在民国初年快速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形成。川帮银行家作为内陆地区的银行家群体,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本地区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表现在业务经营上具有浓厚的旧式商号色彩,管理理念上偏重传统思想,关系网络上构建以“帮”为特色的体系,文化价值观上奉行群体冒险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川帮银行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江浙、闽籍华侨银行的金融现代化道路,以聚兴诚银行为代表的川帮银行业绩卓著,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成为华西财团的支柱。

关键词:川帮银行家;发展历程;群体特征;金融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2-0107-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210

银行是社会金融通的枢纽,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而银行家作为银行的实际掌控者,对银行的发展方向、经营风格、管理理念等方面具有决定性影响。近年来,学界除对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等代表性银行家的研究日益增多以外,也逐渐重视对银行家群体的研究,在这之中既有对整体意义上银行家群体的讨论,也有对江浙银行家、闽籍银行家等沿海地区银行家群体的分析。然而相较于沿海地区,学界对以川帮银行家为代表的内陆地区银行家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缺乏专门系统的探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家群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一般而言,我们把聚兴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重庆商业银行、川盐银行、和成银行等20世纪10—30年代在四川重庆创立并在金融业、工商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六家著名银行称为川帮六大行,以这六家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为代表形成的银行家群体即为川帮银行家群体。本文以川帮银行家为视角,探讨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与过程,以及他们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因应独特的社会环境,并逐渐体现出较强的“聚合作用”?同时,作为具有鲜明地域性的银行家群体,其异于其他银行家群体的特征是什么?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当前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川帮银行家形成的背景

川帮银行家形成的背景与近代重庆对外开放格局紧密相关。1890年,随着重庆开埠,地处西部内

收稿日期:2023-12-21

作者简介:辜雅(1989—),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川帮银行家与四川地方政府关系研究(1911—1937)”(22CZS065);2023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近代中英文报刊所载成渝地区金融资料整理与研究(1915—1937)”(23SKGH091)。

陆的重庆逐渐跨出封闭的区域,不仅在经营业务上与外界有了更为紧密的交流,也促使经营者由旧式商人向新式商人转变。同时,一批先进的商人或留学日美、或北上求学、或商战上海,在丰富的学养与拓展的视野下萌发了建立新式银行的想法。

(一) 重庆开埠与新式商人群体的形成

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素来是“四川之咽喉,而扬子江上流之锁钥”^[1],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晚清以降早已为西方列强所垂涎。但长期以来,重庆因三峡阻隔,与外界交流甚少,生产之“所有土产,本境销售则有余,流通广远则不足”^[2]。直到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后,重庆方才正式开埠。1898年英国人立德乐乘坐“利川”号,突破长江天险抵达重庆。此后,重庆与外界的交流空前增强,大大促进了重庆本地商人的转变。如重庆本地有“汤百万”之称的汤子敬,重庆开埠后逐渐开始做外贸生意,从上海购进洋货来重庆销售,同时开设商号、钱庄等机构,积累了相当的家产,显赫一时。又如重庆富商杨文光,一改之前只做上货的办法,把上下货视为一个整体,“数千里沿江而下上,供剂盈虚”^[3]。在经商获利后,积极兴办商号,获利甚巨,最后“简直把银子当成商品来买卖”^{[4]21},逐渐把商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以汤子敬、杨文光等为代表的商人均是传统学徒出身,早年业务多限于川渝,对新式商业不甚了解。然而重庆开埠后,他们与生俱来的开拓创新精神得以彰显,不再满足于狭小的本地市场,而是沿着长江经济带,利用重庆“进则出长江,退则扼川东进而影响全川以至西南诸省”^[5]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实施“对内开放”,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建立紧密联系,构筑了内陆地区的开放新格局。同时,他们逐渐把金融资本作为经营的核心,形成了金融带动实业发展的新模式,体现出新的资本运作方式,完成了从旧式商人向新式商人的转变。

(二) 求学与实践奠定银行家雏形

重庆部分商人基于本地实践完成新旧转换之后,便希望通过海内外求学、闯荡上海等方式,探求更深层次的长远发展之道。1906年,杨希仲抓住四川总督锡良派遣学生留日学习铁道的机会,进入日本岩仓大学铁道科学习交通^[6]。但杨希仲对于交通完全不感兴趣,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商业上,他发现日本三井家族的模式“系本家庭财力集中凝聚,次第向外发展”,非常值得借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家书一月数至,无处皆详陈三井之演进擎划也”^[7]。其后,杨希仲还辗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科,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美国商业经营的理论,还积极投身实践,与好友杨继武合组中华物产会社,尝试运送桐油直销美国^[6]。同样,康心如在其兄康心孚的影响下也东渡日本求学。康心孚、康心如兄弟的父亲一直倾向维新变法,支持孩子们学习西学,康心孚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当时的康心如对于“远在日本的大哥,简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崇拜和信仰”^{[8]171},于是追随其兄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专门攻读政治经济专科^{[4]135}。1915年,刘航琛到北京求学,先在汇文大学念书,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研究经济金融,对国外的经济理论,尤其是金融学的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成绩优异,刘航琛做毕业论文时“凭其聪明,广为征引,系主任批阅时,亦叹其博识”^{[4]216}。应当说,重庆本地商人跨出封闭的区域,通过外出留学或求学,系统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经济金融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同时开阔了眼界,培养了一种具有全局性的世界眼光,使得他们驾驭区域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这种学识的深度和眼界的高度在当时的重庆确不多见,为其以后在财政金融领域大展宏图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杨希仲、康心如、刘航琛等求学带来的是知识、视野和思想的改变,那杨燊三到上海坐庄,则现实商战给他带来新的震撼。杨燊三从小“读书不多,即学生意”,通过潜心研习,成为“杨氏弟兄中颇孚众望的经商能手”^{[9]356}。1904年,杨燊三被派往上海担任聚兴诚商号上海分号的负责人。上海作为通商大埠,远非僻处内陆的重庆可以比拟,杨燊三原本作为重庆大户人家出身,充满了自豪,此时才觉得“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颇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于是杨燊三在上海“一头扎进商海之中,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

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10]286}。这段经历使得杨燊三通过实践层面认识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商人的经营方法,看到了重庆本地商业的局限,拓展了经商的人脉,通过“久习商场,经验宏富”弥补了其学识的不足^[11],积累了远超重庆本地商人的经验,这是同时期重庆其他商人所不具备的。

重庆开埠和本地商人外出求学、经商是川帮银行家形成的最重要背景。重庆开埠后,旋即从“僻处内陆”变为开放高地,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带来的业务增长,不仅使商人积累了丰厚的家产,更实现了经商模式的根本性变化。这种转变又促使更多的青年跨出山川阻隔的重庆,或远赴日美留学、或北上专修经济、或商战上海外滩,具备了远超旧式商人的体系化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国际视野、现代化的经营经验,为他们从事专业性更强的现代金融业奠定了基础。正如杨希仲曾回忆“余在日本及美国留学,即关注于商业一门,回国之初拟创办一大银行,以调和金融”^[12]。重庆“非有一商业银行为转输,断不能以资挹注”^[13]。康心如回国之后,即在四川银行中担任待付课课长,走上了金融之路^{[4]135}。刘航琛运用所学对重庆金融现状进行缜密分析后认为“当时四川有四家银行,皆不适于我们运用”,因此“我下决心自办银行”^{[14]117}。在这之中,他们作为银行家的思想雏形也慢慢形成。

二、川帮银行家群体形成的过程

川帮银行家作为区域银行家群体,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深深根植于重庆本地银行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之中。1915年聚兴诚银行成立,杨燊三、杨希仲、昆仲作为首批银行家登上舞台。20世纪20—30年代,以四川美丰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市民银行、川盐银行等为代表的重庆本地商业银行纷纷建立,康心如、刘航琛、潘昌猷、吴受彤等银行家陆续登上舞台。他们在实践中因地制宜,主动创新,探索出自己的经营之道。在此基础上,他们以地缘为基础,业缘为纽带,通过社会关系网络链接为一个群体。随着重庆银行公会的建立,其在应对金融风险、促进业务发展上展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其作为银行家群体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一)重庆银行业的建立与本地银行家的出现

四川本地银行家的出现得益于1915年聚兴诚银行的建立,其后在聚兴诚银行的带动和引领下,重庆出现了一个川帮银行的创设高潮,近十家银行相继建立,重庆也成为四川的金融中心。经过市场和金融风潮的冲击,只有少数银行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成为区域的代表性银行。它们的经营者大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理念,把银行的经营作为终生追求的事业,具有创新的强烈意愿,能够使银行业务取得长足发展。

1915年成立的聚兴诚银行是四川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其肇始于清末富商杨文光成立的聚兴仁商号,具有典型的旧式金融机构的特征。杨燊三、杨希仲在创设聚兴诚银行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实际情况,采用了当时新式银行较少使用的股份两合制度。根据股份两合制度,银行的股权分为有限股和无限股,各占一半,无限股全部由杨氏家族成员认购,有限股除杨氏家族成员认购外,还分给亲戚、伙友。聚兴诚银行采用股份两合制度后,有效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消弭了成立时“群怀疑虑,不敢贸然加入本行”的窘境^[15]。杨燊三与杨希仲作为经营者“学识经验,互相参证”,使得聚兴诚银行的“业务遂蒸蒸日上”^[16]。杨氏昆仲在聚兴诚银行建立过程中对银行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既有对经营传统的考量,也有对本地环境的审视,是内陆地区银行家独立探索金融现代化道路的先声。

1922年成立的四川美丰银行是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美国人雷文(Frank. J. Raven)担任总经理,康心如则“以协理的名义主持内部工作”^[17]。四川美丰银行成立之初,营业上“搬用一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大吹大擂办理‘新式银行’的存放汇兑业务”^{[18]10},全然不顾重庆本地业已成熟的比期存款、信用放款等做法,导致营收惨淡,多次爆发挤兑风潮^[19]。康心如忧心忡忡,劝说雷文结合川渝实际开展诸如比期存款等业务,逐渐扭亏为盈。美方经理直言不讳地说“此实康协理之功”^{[8]191}。

1927年,美方因“宁案”(又称“南京事件”)后的反帝浪潮回国,并将“所有美股悉数让渡华股承受”^[20]。四川美丰银行转为华商独资银行,康心如任总经理。其后,康心如积极践行本地化经营理念,营业取得长足进步,1935年纯益达29万元,其发展“蒸蒸日上,不卜可知”^[21]。

1929年,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处长刘航琛为弥补财政赤字,提出建立川康殖业银行,以“调剂金融,扶助川康生产事业”为宗旨^[22]。1930年9月1日,川康殖业银行正式开业,不久后刘航琛任总经理。为了满足刘湘军费的需要,刘航琛主持下的川康殖业银行“会同同业捐输军饷,以助安川工作”。然而,刘航琛深知完全依靠“捐输军饷”,银行的发展必定畸形,不能长久。因此,他在积极解决二十一军军费开支的同时,“举凡农村贷款,实业投资,无不尽力经营”^[22],竭力平衡好军需和日常经营之间的关系,刘航琛“亦官亦商”的经营才能得到彰显。1937年9月21日,在刘航琛的主导下,川康殖业银行合并四川商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成立了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其发展迈入了新阶段。

1928年重庆正式建市以后,潘文华任市长,市政建设需要大额款项,遂着手建立自己的市民银行。1931年1月5日,重庆市民银行正式成立,股本50万元,商股占五分之四,官股占五分之一,潘文华的弟弟潘昌猷任总经理。重庆市民银行成立后,潘昌猷除通过潘文华的关系,获得一些特别的营业机会外,更率先开办了“妇女储蓄部”,并录用女职员,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营思想,从而“营业畅旺”^[23]。1934年夏天,万县市民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因“名称一有雷同,普通社会殊难识别”^[24],重庆市民银行也因此发生挤兑风潮。潘昌猷以此为契机,在1934年8月宣布取消官股,改组为重庆银行。此后,重庆银行在潘昌猷的经营下,“信誉日隆”^[25],1936年增资至100万元,并于1945年更名为重庆商业银行(仍简称重庆银行)。

长期以来,重庆市面的盐商因“苛捐重叠,派垫频仍”,以致于“价高销滞,盐积商困”,迫切需要能够周转盐商资金的银行^[26]。有鉴于此,1930年春,四川盐运使王赞绪联合盐运使署科长吴受彤等人商议成立重庆盐业银行,以“维持盐业金融,救济井灶行商经济恐慌”为宗旨^[27]。但重庆盐业银行很快因金融风潮难以支撑,1932年6月改组为川盐银行,吴受彤担任董事长。在吴受彤的经营下,川盐银行逐渐从“扶植盐业经济”的专业银行向综合性商业银行转型,把经营盐业与保险、房地产等业务并重,“而于金融业中,声誉鹊起,故数年间,业务颇为发展”^[28]。这种转型与吴受彤对银行与金融的认识密不可分,他深知盐业虽然重要,但若束缚于此,则业务狭隘,终究不能长远,更无法在银行界立足,体现了他作为银行家的长远眼光。

纵观上述代表性银行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各家银行成立背景不同、特色各异,但无一例外均与其经营者的理念息息相关。他们系统学习过先进的金融知识,又长期深耕重庆,深谙本地区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现状,能够结合实际情况“融通中西”,舍弃不合时宜的做法,体现了以“现代财经理论、银行实践为依托的经营者素养”^[29],具备了作为银行家的特征,并为银行家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川帮银行家的形成与身份功能的实现

随着重庆本地银行家的出现,他们在日常经营中,逐渐通过业缘、地缘等关系联系起来,继而形成了区域性的银行家群体,并充分实现了作为专业化群体的身份功能,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从业者单打独斗、疏离社会的面貌。

其一,他们以业缘为纽带,互相参股、互任董事、监事人,彼此扶植,共同发展。杨燊三担任聚兴诚银行总经理后,自己不便出面,便聘请岳父黄锡滋担任监察人,同时黄锡滋又是四川商业银行的董事;康心如作为四川美丰银行的总经理,但同时又担任四川商业银行的监察人;刘航琛当上川康殖业银行总经理后,便力图插手聚兴诚银行,1937年趁聚兴诚银行改组之机,成功当上聚兴诚银行的董事,股份达400股之多^[30];甘典夔和何北衡作为刘湘的得力干将,常以银行从业者自居,甘典夔任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川康殖业银行监察人;何北衡任川康殖业银行董事长,四川美丰银行监察人,以及聚兴诚银行的董事。这种相互参股、互为董事和监察人的情况为彼此开展合作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资本市场

不健全造成的外部治理机制的缺陷,促进了银行家群体的形成。

此间,他们的合作也更加频繁,如1932年杨燊三与刘航琛、吴受彤等商议支持重庆自来水厂的建设,聚兴诚银行与川康殖业银行借款2万元,川盐银行借款1万元^[31]。又如1937年3月,他们联合设立兴业银公司投资四川实业,聚兴诚银行、川盐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各出资37万元,重庆银行出资36万元,刘航琛任董事长,康心如、吴受彤、杨燊三、潘昌猷等任常务董事^[32]。伴随着银行家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也相应提高,已经具备作为群体实现身份功能的条件,而他们积极涉足市政建设与地方开发,正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实现身份功能的集中体现。

其二,他们以地缘为依托,成立行业同业组织,维护行业利益,促进共同发展。早在20年代,中国银行、中和银行、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等便组成了“联欢会”,成为重庆银行协会的雏形。1931年9月25日,根据当局《工商业同业公会法》的要求,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重庆平民银行、重庆市民银行、重庆盐业银行一起正式成立了重庆银行公会^[33]⁹⁷。重庆银行公会立足于“共谋发展”,把“增进金融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金融上之弊害”定为宗旨^[34]。此后,川帮银行家在重庆银行公会的旗帜下精诚合作,在稳定四川金融秩序、整理川省金融以及支持川省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不容小觑的力量。1933年1月,重庆银行公会提议成立重庆票据交换所,杨燊三、康心如、刘航琛等银行家对票据交易所的筹建进行了详细研讨^[35]。5月30日,重庆银钱业联合公库成立,附设票据交换所,刘航琛担任主席。新设立的票据交换所“完全为调整金融机关”,坚决不承担军政开支^[36]。又如1933年8月,四川善后督办署成立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发行准备库,对外发行名为“地钞”的兑换券^[37]。但“地钞”发行后,由于信用匮乏,挤兑频发,成为“四川金融无穷之累”^[37]。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杨燊三、康心如、刘航琛等银行家积极支持以法币调换“地钞”,带头申领信用尚未牢固的法币^[38],既助力“地钞”挤兑风潮的平息,又改善了重庆本地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可谓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顺利的把一切积弊肃清了”^[39]。无论是票据交换所的建立还是平息“地钞”挤兑风潮,都体现了川帮银行家作为专业化群体的身份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充分实现。

综上所述,伴随着川帮银行的发展和银行家的出现,他们开始谋求以群体的姿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深度融入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之中。他们更加注重从银行业的“一域”来服务重庆的全局,而通过银行家的身份功能改善营商环境,又使得全局能更好地谋划银行业的“一域”,形成了川帮银行家与区域经济发展良好的互动局面。在这之中,川帮银行家的对内号召力和对外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增强。

三、川帮银行家的群体特征

川帮银行家与江浙银行家、闽籍银行家、粤籍银行家等银行家群体相比,不乏相似之处,如对同乡同籍人际关系网络较为依赖、注重通过家族联姻保持商业长盛不衰、热衷投资实业等。但川帮银行家根植于本地环境及自身经历,形成了有鲜明辨识度的特征。这种特征集中表现在业务经营上具有浓厚的旧式商号色彩,管理理念上偏重传统思想,关系网络上构建以“帮”为特色的体系,文化价值观上奉行群体冒险的精神等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川帮银行家区别于其他银行家群体的显著特点。

(一) 业务经营方面,具有浓厚的旧式商号色彩

重庆的金融市场,有着与许多其他金融场所不同的特征,比期制度、信用放款等都是其典型表现。比期制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存放款制度,它指的是“金融市场所有资金的供需,借贷关系,均呆定于每月半及月底交割”,即以“十五日为一比期,每届月半及月底进行结算”^[40],重庆本埠的银行均“以比期存放款为主要业务”^[41]。由于比期时间短,一到结算时,群起交割,银行往往“以有限的资金,应无穷的需要,利率自然上涨”^[40],极易发生金融风潮。而刘航琛、吴受彤、潘昌猷、康心如等银行家,既仰仗银行

雄厚的财力,又凭借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往往通过高利率获取厚利,只是广大商民与企业深受其害。唯有杨燊三在经营一段时间的比期存款后,深感其弊端,认为“比期存款,恶例既开,自难根除”,决定现有的比期存款户头“可听其渐渐消减,以后即不再新添”^[42]。

信用放款也是重庆银行业的特色。一般而言,作为新式银行,应采用抵押放款,但重庆银行业“虽组织大致模拟外国方式,而经营银行业则类似本地钱庄”,对钱庄与个人“皆按其信用及声誉便贷与款项,不需要任何担保品”^[43]³⁴⁰。如杨燊三在经营聚兴诚银行时,十余年间都采用信用放款的方式,虽偶有盈利,但“信用不孚者,则往往以伪寐者欺诈,致本行叠受损失”^[44]。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他要求分支行处填报信用调查申报书时“对于所有往来,重新切实调查,务期详尽周密”^[45]。其后,更进一步指出“对同业之委托可接受,对钱庄之委托应推卸”^[46]。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部分地“改对人信用的习惯为对物信用的习惯”^[47]¹¹⁷。四川美丰银行在中美合资时期,美方坚持放款一定要有抵押,不认可信用放款,故与其他川帮银行格格不入而打不开局面。康心如深知美方是担心“用一纸条即将款项易去,难免不生变端”^[48],于是康心如创制了“放款往来限制表”来审核贷款人财力。是否放款完全凭借放款对象的业务与信用状况决定,同时坚决杜绝凭借私人感情任意放贷的“潜规则”^[18]¹⁵⁻¹⁶。如此一来,业务才得以好转,亦可见川帮银行业对信用放款的执念。

应当说,川帮银行家无论是注重比期存款还是采用信用放款,本质在于对旧式商号钱庄经营模式的路径依赖,对彻底转型为新式金融机构的不确定性存在顾虑。这种路径依赖体现在旧式的钱庄商号面对的往往非普通人家,而是具有一定财力的商人,长期以来形成了“重面子、快交易”的习惯和心理。重庆山高路不平,江河交错的地理环境使得交通不便,客观上对“快交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新式银行则要面对中小储户广泛吸收存款,存在本质的不同。川帮银行家过于依赖传统模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川帮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尤其是和外埠银行进行业务交流时,制度上的不对等无形之中树立了高墙,客观上拉大了重庆银行业和外埠,特别是沿海地区银行业的差距。直到全面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经济中心,当局通过法令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让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二) 管理理念方面, 偏重传统思想

银行作为近代以来的新式机构,大都以西方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为根基,如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在重大决策时都“切实贯彻了正当程序原则、股东权利原则和公开交流原则”,保证“议事民主、决策民主或者程序民主”^[49]⁶⁷⁻⁶⁸。然而,这种现代银行本应秉承的民主治理模式,在川帮银行家中并不多见。当时川帮银行的“初学贸易者大半由亲属介绍入行”,其“习业务阶级之严,待遇之低,似沿帝制余风”^[50]。以杨燊三为例,其所招收的见习生需向他履行投师手续,“一律要磕头,礼仪极为隆重”,并由他亲自教授德育和智育,形成极为密切的师徒关系^[51]。而作重大决策时,几乎以杨燊三一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他曾说“多数表决,自应尊重公意舍己从人”,但实际上,除少部分高级行员外,其余“皆噤不作声”^[52]。而在行员管理上,杨燊三更以带有浓厚儒家“致良知”思想的“三眠说”来教导行员,他认为人生的三个阶段,就如同蚕的“三眠”,“蚕经三眠方能吐丝,人历三眠事业乃成”^[53]²³⁵。三眠分别对应忍耐、自持和坚定,实则告诫员工要磨炼心性、塑造灵魂。杨燊三常以“三眠说”来教育和行员,如1931年行员金丽泉以神经衰弱请长假,杨燊三以自己的例子予以劝慰,他提到自己因其兄杨希仲去世而面临“业务衰弱,为世所讥”的环境时,几乎“险难自持”,多亏他自己“认识之坚定”,最后“始得超然历三眠而存焉”^[54]。

银行是高度依赖信用的现代金融机构,其内部治理体系必须保证有完善的纠错机制,以防止经营者决策偏差导致金融风潮。然而,川帮银行家即便学习了先进的治理理念,但在实际经营中仍多采用高度集权的传统治理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长期封闭社会中形成的习惯使然,祖辈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从小的耳濡目染都使其在脑海中根深蒂固,难以变更。另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前,外埠银行在重庆建行较少,川帮银行业缺乏外埠竞争与先进理念的冲击,其改弦更张的动力似有不足。待到战时大量沿

海地区银行业内迁重庆,先进理念带来的高效率与高绩效,才使得川帮银行业摒弃传统束缚,迎来了新的发展。

(三)关系网络方面,构建以“帮”为特色的体系

学界长期称重庆的银行家群体为“川帮银行家”,而非“川籍银行家群体”,可见“帮”派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于沿海地区银行家群体普遍具有的“以更开放的心态吸纳各种金融机构的做法”^[29],川帮银行家更多把以籍贯和地域为核心的“帮”视作根基。体现在行员的录用上,所选拔之人均以川籍为主体,同时延聘本地具有声望的社会人士充任银行重要职位。如杨燊三主持的聚兴诚银行,1929年全行行员中川籍占比达到了61.2%^[55]。同时杨燊三还加大了对川籍本地人才的培养,“所造就之人才,识见每超越群商,而川蜀中等学生引入商场,亦自本行始”^[50]。另外,杨燊三、康心如等还创办了重庆实用商业学校,招收重庆本地学生,开设经济学、会计学、银行学、财政学等课程,培养的人才又多被川帮银行聘用^{[56]169-17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涵盖多职位的“帮”派体系。

此外,这种“帮”派体系还体现在与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当局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学界认为北洋政府时期“银行家群体与政府关系并不紧密”^[57],而即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银行家群体为核心的“上海资本家与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盟的论断也应当摒弃”^{[58]12}。然而川帮银行家则完全不同,刘航琛、吴受彤、潘昌猷或在政府担任要职,或与军阀有至亲关系,自不待言。康心如也非常认可刘湘提出的“枪杆子与洋钱结合”的理论,表示“愿为刘湘筹集庞大军费、缓急相通效劳”^{[4]144-145}。杨燊三更公开表示,“重庆金融界和二十一军的利害关系太深,不妨暂与合作”,甚至提出“在二十一军防区内作商民,实属万幸”^{[18]34}。进而形成了一个由银行家群体主动搭建的政商关系网络,而地域性的“帮”派则成了维系网络的核心。

川帮银行家以籍贯和地域为核心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典型的“帮”派特色,对内形成了多层次且对任职银行高度认可的经营团队,对外则通过紧密的政商关系形成了利益高度同构的共同体。这种内外双向关系网络具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团体所不具有的牢不可破的特点,有效构建了川帮银行稳定的内外环境,虽然其内在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显著不同于沿海地区以“在商言商”为标志的银行家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双向关系网络最大程度对冲了因军阀混战带来的外部动荡,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客观上促进了川帮银行业的发展。

(四)文化价值观方面,奉行群体冒险精神

重庆作为内陆地区,营商环境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正因如此,重庆的银行家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富贵险中求”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投机和冒险属性。如杨燊三在辛亥革命时期,不顾家族众人要求其秉持“稳慎行事,以度危局”的营业方针,集中家族财力囤货。直到半年之后,时局明朗,杨燊三把所囤积货物倾囊售出,获得巨额利润^{[59]106}。而当银行家群体形成后,这种冒险变为一种行业共同秉持的文化价值观。1932年4月,重庆证券交易所成立,杨燊三任理事长,康心如、吴受彤、刘航琛等任监事。川帮银行家成立证券交易所不是着眼于资本市场的规范,而是看重其中的申汇投机。重庆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即规定“所有远期汇票,一律在证券交易所内买卖”,使得交易所内“买空卖空,投机狂热”。杨燊三曾说“过去重庆的申汇,为钱帮所操纵把持。现在,交易所成立了,形势便转变了”^{[18]43}。此举引发了重庆钱业的不满,但杨燊三、刘航琛、康心如等仰仗雄厚的财力,最终仍把申汇投机控制在交易所内,钱业再也无法染指。通过申汇投机,1933年重庆各银行的利息及汇水收入,竟然占到了全部收入的75%-99%,成为“银行业发达之一因也”^[60]。

川帮银行家的群体冒险本质上是利用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完备而进行的商业投机行为,“风险共担,利润共享”是其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备,这种投机冒险并不具有可持续性。1935年法币政策施行后,各地汇价趋于平衡,川帮银行家们意识到“国内汇兑终当失却其银行营业要目之地位,则固时间问题而已”^[15]。申汇投机不再成为川帮银行家群体冒险的主要选项。这深刻揭示了建立

完善内外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唯有让行业在健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压缩投机空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作为投资者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结 语

川帮银行家以重庆本地银行的快速发展为基础,在业缘和地缘的交互作用下,通过互相参股与兼任职务等方式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银行家群体。作为内陆地区的银行家群体,川帮银行家受限于传统习惯、区域现状等因素,不能像江浙银行家那样在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中毫无包袱地向当时的西方学习,也不像闽籍银行家那样本身就海外归国华侨为主,通过建立跨国经营网络,自然而然地把海外成熟的做法移植到内地,而是秉持“因时而新、因地而新、因需而新”的理念,把新式金融业的基本原理同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主动把自身发展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形成了政商相联、业内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同时,在这种模式之下,川帮银行家具有了与其他银行家群体迥异的群体特征,这种特征在业务经营、管理理念、关系网络、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均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也形塑了川帮银行家的独特气质。我们在思考这一特质时,既要看到它守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因应内陆环境的合理性。事实上,相当部分川帮银行取得了较大成就,如聚兴诚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亦应在前五名之列”^[61]。总体而言,川帮银行家作为专业的银行家群体对行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改善重庆金融业营商环境、推动重庆金融现代化的目的。

尽管川帮银行家的事功是近代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但对当前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不无启发借鉴之处。一是要充分发挥银行家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银行家群体的个性与共性,通过提供差别化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措施最大程度实现银行家群体的身份功能。二是在打造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沿海、海外经验之间的关系,既要积极学习沿海和海外地区的先进经验,又要重视本土环境生成的地方经验,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做到兼收并蓄,更好满足行业和地方发展的需要。三是完善内外部治理机制,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构建良性的“择优竞争”环境,坚决破除阻碍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让银行家群体在更大平台上实现自我完善,从而促进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金沙. 四川贸易谭[J]. 四川, 1908(02): 83-95.
- [2] 川督鹿覆奏筹办商务并派绅士经理折[J]. 渝报, 1897(08): 2-5.
- [3] 梅黍雨. 清封朝议大夫杨府君墓志铭[J]. 聚星月刊, 1925(03): 81-83.
- [4]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联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重庆工商人物志: 重庆工商史料第三辑[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4.
- [5] 王安宁. 重庆地方文化三议[J]. 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03): 99-101.
- [6] 金逸明. 川帮银行的首脑—聚兴诚银行[J]. 聚星月刊, 1948(05): 28-32.
- [7] 杨锡融. 先考继妣事略[J]. 聚星月刊, 1925(吉号): 51-57.
- [8] 柳渝. 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上[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9] 李青, 陈文斌, 林祉正.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川卷重庆分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 [10] 柳渝. 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下[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11] 聚兴诚银行之略历[J]. 中行月刊, 1931(04): 51-52.
- [12] 关于四川省重庆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申请登记注册并鉴核公司营业概算书、修正章程的呈、批、证明书、训令附简章、清册[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 02950001000010000001000.
- [13] 关于汇报《聚兴诚银行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的提纲[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 02950001007160100001000.

- [14]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 访问;张朋园,刘凤翰. 纪录. 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15] 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工农业决算报告书[A]//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Q286-1-144.
- [16] 聚兴诚银行简史[J]. 聚星月刊,1932(37):49-50.
- [17] 培根. 康心如与四川美丰银行[J]. 川康建设,1943(2/3):98-102.
- [18]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联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重庆五家著名银行[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19] 四川美丰银行二十年来概况[J]. 四川经济季刊,1944(03):192-193.
- [20] 银行介绍:四川美丰银行[J]. 金融导报,1942(11):23.
- [21] 四川美丰银行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书[J]. 经济杂志,1936(02):73-78.
- [22]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小史[J]. 四川经济季刊,1944(03):195-198.
- [23] 重庆市民银行推广营业[J]. 四川月报,1933(03):34-35.
- [24] 重庆市民银行改名重庆银行[J]. 中行月刊,1934(04):89-90.
- [25] 商业介绍:重庆商业银行简史[J]. 中国工商新闻,1946(02):17.
- [26] 王运使为筹设重庆盐业银行请二十一军部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查照并予保护函[J]. 川盐特刊,1930(138):84-88.
- [27] 重庆新设川康殖业、市民、重庆盐业等银行[J]. 中央银行旬报,1930(27):23.
- [28] 川盐银行概况[J]. 联合经济研究室通讯,1946(06):19-26.
- [29] 兰日旭. 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变迁及其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探析[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03):75-88.
- [30] 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有限公司责任股东临时会议决议录、聚兴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录、董事监察人调查报告书等[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295000100072000008000.
- [31] 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第13次临时会议记录[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086001001170000021.
- [32] 川省金融阵容严整,兴业银公司正式创立[N]. 国民公报,1937-03-23(7).
- [33] 田茂德,吴瑞雨. 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一九一一—一九四九)[M]. 成都:四川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
- [34] 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章程[J]. 四川月报,1934(03):66-75.
- [35] 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第25次临时会议记录[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0860001001170000033.
- [36] 联合公库开委员行庄大会[N]. 商务日报,1933-12-30(10).
- [37] 楷. 民国二十四年四川金融之回顾[J]. 四川经济月刊,1935(2/3):7-32.
- [38] 渝金融界安渡年关[N]. 新蜀报,1936-01-01(3).
- [39] 阮曙航. 币制整理后四川金融之展望[J]. 西南评论,1936(01):19-22.
- [40] 刘连宇. 重庆的比期存放款制度[J]. 兴业邮乘,1948(160):12-14.
- [41] 康永仁. 重庆的银行[J]. 四川经济季刊,1944(03):102-155.
- [42] 总渝同人第七十次朝会纪录[J]. 聚星月刊,1933(12):24-27.
- [43] 周勇,刘景修.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44] 总渝同人第七次朝会纪录[J]. 聚星月刊,1932(31):45-50.
- [45] 本行业务发展之经过[J]. 聚星月刊. 1948(06):35-37.
- [46] 关于分发聚兴诚银行第四次行务大会议决致聚兴诚银行万县分行的通函 附议决[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2950001007170000016000.
- [47] 卢作孚. 东北游记[M]. 成都:成都书局,1931.
- [48] 四川美丰银行董事会1921年9月至1934年1月会议记录[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2960001000220000001000.
- [49] 李国胜. 浙江兴业银行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 [50] 聚兴诚银行演进之经过[A]//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2950001018420000036000.
- [51] 聚兴诚银行沿革股东名册组织规程及天津聚兴诚银行历史[A]//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号:J206-00042.
- [52] 槃三. 对于行员之希望[J]. 聚星月刊,1929(23):1-12.
- [5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 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4] 谢宗鑫. 记总理杨槃三君之言一为金丽泉请假[J]. 聚星月刊,1931(24):81-83.

- [55] 十八年全体行员一览表[J]. 聚星月刊,1929(23):34-59.
- [56] 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十二辑[M]. 2002.
- [57] 黄蕾,张林友. 近代华资银行家群体变迁研究[J]. 东南学术,2018(03):173-181.
- [58] 小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M]. 杨希梦,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5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60] 焯. 重庆银行业之检讨[J]. 实业周报,1935(12):3-5.
- [61] 聚兴诚银行素描[J]. 新世界,1944(10):15-19.

Formation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Bankers (1915-1937)

Gu Y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Sichuan banke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bankers. They origina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came into being in the 1930s. Chuanbang bankers, as a group of bankers in inland areas, a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have distinct group characteristics. It has a strong old-style color in business operation, emphasizes traditional ideas in management philosophy, builds a system featuring “gang” 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pursues the spirit of group adventure in cultural values. It is based on such characteristics that Chuanbang bankers have walked out of a road of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OCBC Banks and Minji OCBC Banks. Chuanbang Banks represented by Juxingcheng Bank hav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have certain influence in the country, and become the pillar of the West China Consortium.

Keywords: Sichuan bankers; development course; group characteristics;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陈忻]